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第003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1年10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学术聚焦	02
林毅夫、达斯古普塔等 为什么要重新定义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	02
埃德蒙·菲尔普斯 万众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力的源泉.....	08
林毅夫 创新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要释放和保护每个人的创造力	13
菲尔普斯、林毅夫、薛澜 创新的关键理念与举措	16
月度精选	30
姚 洋 共同富裕,须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30
余淼杰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34
黄益平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	38
林双林 减税降费的关键是普惠式降低企业所得税	30
陈春花 如何重构组织价值,开启新增长	34
谢绚丽 数字时代企业竞争战略的三大变化	38
学院资讯	41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03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3期与您见面了。

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栏目上，依然是学术聚焦和月度精选两大版块。

学术聚焦：本期我们聚焦的是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和创新活力两大主题。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众所周知，随着反常气候的增多，生物多样性正在快速下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也选择于10月在中国昆明召开，人类不得不反思过度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为此，北大国发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组织，由林毅夫教授牵头，特别发起了一场全球经济学的前沿对话。主对话嘉宾达斯古普塔教授是剑桥大学教授、全球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重要开创者；另外三位对话嘉宾也都是低碳经济学、环境生态学等相关领域非同凡响的专家。如果说全球双碳目标的制定离不开气候经济学的推动，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早一点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义。创新活力的主题内容来自林毅夫教

授与诺奖得主费尔普斯及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教授的对话。新冠疫情使全世界更加需要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货币超发所带来的GDP增长。如何才能让政府和公众都认识到创新不仅是科学家的事情，还是每一个人的潜力和责任？如何形成这样的文化？如何塑造这样的制度与环境？值得经济学家深思和推动。

月度精选：本期我们选择了共同富裕的主题文章，分别来自姚洋教授、余淼杰教授和黄益平教授。自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来，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发展的热点话题，引起广泛关注。我们特别选择了三位教授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时，我们还在本期特别精选了两篇管理文章，分别来自陈春花老师和谢绚丽老师，就数字化时代的组织价值重构和竞争战略问题带来智慧分享。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为什么要重新定义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

林毅夫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帕萨·达斯古普塔 (Partha Dasgupta)

英国《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的学术牵头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

徐晋涛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林秀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薛进军

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林毅夫：众所周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比如河南郑州、美国纽约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地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还有北美被热浪席卷等。有研究认为，所有这些极端天气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2015年170个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同意采取行动，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C以内。

人类面临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威胁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计和福祉依赖于大自然。然而，近几十年来，以生物多样性丧失为代表的自然退化速度惊人地加

剧。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虫类动物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68%。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统计数字则表明：5%-20%的脊椎动物和树木物种现在面临着灭绝的威胁，而且物种灭绝正以百倍的速度增长。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类似于《巴黎协定》的全球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今年2月，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发布了《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提供了可靠的分析并呼吁采取行动。

本文根据菲尔普斯2021年7月30日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的圆桌对话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我认为,该评估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就像《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样。

我很荣幸成为该评估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我发现该评估的结果和建议与中国政府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新的发展理念高度一致。我们知道,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10月在昆明举行,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新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是讨论《达斯古普塔评估》并共同引起关注和呼吁、采取行动的好时机。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很高兴在COP15召开之际组织这次圆桌会议。我们很高兴达斯古普塔教授与徐晋涛教授、薛进军教授、张林秀教授一起参加圆桌对话。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之间的关系

林毅夫:首先,我向达斯古普塔教授提问。多年来,环境保护的关注点一直是气候变化。但如您所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气候变化的关键原因,反之亦然。在某种程度上,生物多样性的危机更加令人担忧,因为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量化其对人类的意义,而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两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它们有何不同?

达斯古普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非常明确。大部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由于土壤用途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例如砍伐热带雨林将土地用作牧场、开发大豆和棕榈油种植园等。如此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也很清晰,即气候变化,尤其基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如我们当前所见一般,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热浪、火灾、龙卷风、台风等等。这会破坏

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与其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调节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经济学家选择研究气候变化的方式有所不同。气候变化经济学,正如目前在经济学模型和国际讨论中所呈现的那样,将气候调节与自然提供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废物分解、固氮、授粉等)割裂开来。大自然以联合产品的形式向我们提供服务,这些服务相互补充,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独立。因此,如果我们破坏大自然,导致她无法充分为我们提供某种服务,那么其他服务也将受到不利影响。

大自然不会出现在增长和发展的标准模型以及贫困经济学中。公认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只是将气候系统嫁接到没有大自然的模型上。在我发表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评论中提到了大自然服务的多样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上建立经济模型,让我们可以合理地了解经济可能性。

为什么要评估大自然在经济中的价值?

林毅夫:您在评估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经济根植于大自然,大自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并为评估大自然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达斯古普塔:对于林教授和我们圆桌对话的其他嘉宾来说,这些显而易见,但我仍然需要向公众强调一下:我们的经济根植于大自然,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我们的家园。

目前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聪明的大脑将自身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利用科技进步超越大自然的限制。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但它只有在当代经济模式中才有具体表现,即无止境的技术进步可以让我们能够享受更大的物质财富。一定要抛弃这种想法。我们需要在经济模型中以整合的形式引入大自然,也



就是说应该将经济模型嵌入生物圈。

大自然是一种巨大的自生式固定资产。生物圈的所有组成部分,如生态系统等,都是固定资产。它们可以被称为“自然资本”,与建筑物、道路、港口和机器等其他资产一样,生态系统对我们来说也有价值。政府部门采用的经济模型包括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但不包括自然资本。而经济可能性模型不仅应该包括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还应包括自然资本。

我在评估中敦促各国政府,不仅要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例如GDP)来编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还要编制资本核算账户,列出这三种资本的存量。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上一年移交到下一年的资产清单来理解。对存量资产的正确计量必须是对财富的包容性计量,即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社会价值的总和。私营公司要创建资产负债表,国家也应该创建资产负债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该使用会计价格来评估资产价值,而私营公司则可以合理使用市场价格。

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国家的财富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是国家的GDP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世界银行让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只根据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来衡量各国经济的相对成功。

林毅夫:您的解释非常清晰,下面我请薛进军教授发言。他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与增长理论和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薛进军: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的圆桌讨论。众所周知,经济学科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应对不同阶段的需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当世界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时,正如达斯古

普塔教授的评估中所说,经济学科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复苏。然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现了增长理论。

当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时,随之出现的是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

到了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初,正如《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所述,人类社会面临全球变暖。《低碳经济学》(Low Carbon Economics)是我写的一本书,于2011年以中英文出版,为经济学引入一个新的分支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前,生物多样性面临风险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于是,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达斯古普塔教授的这本著作对经济学科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将对经济理论、政策以及我们的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也将改变我们看待世界和思考大自然、社会、人类等事物的方式。

因此,我必须说,非常感谢您对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我正在研究新的经济学,有时会觉得很难理解,所以想利用这点时间向您提出一些问题。

首先,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到增长理论中?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在经济理论中非常重要,将气候变化问题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结合起来将形成创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林教授刚才提到的由斯特恩和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提出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议题。

其次,如何在经济统计体系中反映生物多样性,将生物多样性或自然资本的隐含价值或潜在价值计入到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这是我的两个问题,期待您的答案,谢谢。

达斯古普塔:您和林教授提出的问题都很好,它们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我现在提出一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想法。

首先,我的评估虽然被称为关于生物多样性

经济学的评估,但其重点并不是讨论生物多样性,而应该被称为关于生物圈及其生态系统的经济学。生态系统是固定资产,而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多样性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生物多样性越强,生态系统越健康。

我在这里特意使用了“健康”这个词。生态学家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与全科医师、医生、医学专业人士在意指人类健康时完全相同。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在于是否能将自身转化为我们依赖的各种服务,也就是我之前在回答林教授的问题时所列举的服务。我们享受的这些服务是无形的、无形的,比如气候调节、固氮、土壤再生、废物分解等。只有当这些服务崩溃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所以生态系统是资产。我们需要将之与其他各类资产相提并论,例如桌椅、机械设备、道路和港口、教育和健康等。

可以将生物多样性比作“信任”。“信任”是社会的一个特征,信任水平越高,社会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方面就越有效率。

对于气候变化经济学来说,公认的弱点之一是它只关注大自然的一项服务,即气候调节,而忽视了其他服务。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生物圈是一个由可再生资源(湿地、红树林、珊瑚礁、草原、雨林等——它们都是资产)组成的互联系统,而且,我刚才列举的服务是互补的,并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独立的。所以,如果你对其中的任何一项服务施加压力,其他服务也会崩溃。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第二个弱点是,清洁技术可以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能源。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一旦实现能源转型,GDP就能无限增长。此外,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强调,把全球GDP的2%–3%用于(技术)投资就能实现能源转型,这也使得气候变化问题至少在理论层面很容易解决。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评估中所指出的,对于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一难题,并没有技术解决方案。我们不能用生产性资本来代替生物圈的运转!我们要让大自然恢复健康,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愿意尝试基于大自然的解决方案,才能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意味着我们的投资要从生产性资本转移到自然资本的再生上。

为了让大家了解原因,我们应该始终记住,技术解决方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当你试图过多干预大自然,她会习惯性地反击。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不了解大自然,她太复杂了。毕竟大自然已经经过了43亿年的演化,而智人只有区区20万年的历史。我们与大自然一起进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现在我们却试图凌驾于它。这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真正悲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构建增长模型,将人类经济视为植根于大自然之中,也就是说,人类经济并没有独立于大自然之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学术界不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构建宏观经济学模型。在我的评估中,我制作了这样一个模型的原型,它与气候经济学家提出的模型大不相同。

大自然是一种资产,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包含了从家庭、社会、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对于资产管理问题的研究。

在福利经济学对于幸福感的衡量中,有一个奇怪的分裂型因素。我们通过GDP及其增长率来判断国民经济的表现。但是,当我们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选择投资项目时,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会估算投资回报率——公共投资估算社会回报率,私人投资估算私人回报率,这两种方法都是估算项目现期贴现值的不同方式。在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一条告诉我们应该根据项目对GDP的贡献来选择投资项目!

但请注意,项目的净现值是利润的贴现总和,即现金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现金额就是库存。仅此一项就能看出,净现值衡量的是一



个项目对经济财富的贡献。然而，当我们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我们却不会提到财富，反而仅仅讨论 GDP。没有私营公司会说：我会根据是否会带来 GDP 的增长来选择投资项目。他们不会这么说，而只会关注利润。私营公司想要知道利润流的净现值是不是正值。因此，我们的确有必要转向以财富为基础的衡量指标来评估经济表现。

我在评估中将该衡量标准称为“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表明我们所说的财富包括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之前，我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教授曾称之为“综合性财富”。事实上，中国和新西兰在纳入资本核算账户方面一直处于领先，英格兰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预计，各国政府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基于财富的指标进行评估，而不是采用基于收入的衡量指标。

林毅夫：非常精彩的回答。对于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回应，薛进军教授有什么评论吗？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的区别

薛进军：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回复，我对此回答大致满意。不过，我仍想谈一些我对您的经济学的看法。我在耶鲁大学时师从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学习发展经济学，也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教授那里学到了相关知识，所以我对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有所了解。我对您的新理论非常感兴趣。您想创新一种与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理论。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生态和自然资源这些元素已经被很多人充分讨论过，而包含这些要素的环境经济学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存在。

那么您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跟环境经济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您的新经济学理论涵盖了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或许我的理解不正确，但我确实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

达斯古普塔：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让

我有机会申明我的评估符合经济学推理。我所提出的并非是全新的理论，该评估是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包装。通过接近正统经济学，我完成了重新包装，并在许多需要调整的方向上进行了调整，以便它能够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经济植根于大自然之中，而非独立于大自然之外。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我也是在这门学科的指导下撰写这篇评估，但我不得不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包装。可以肯定的是，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有大量文献，我在撰写评估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素材和观点。但我这篇评估读起来与那些文献大不相同，这并不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在于我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甚至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都倾向于将大自然视为人类经济的外部因素，只有在我们认为需要时才在传统经济模型中引入环境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通常也会提出主流经济模型的附属模型的原因。

举例来说，假设你要研究珊瑚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在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可能性时，您希望能够将其视为固定资产。传统的经济模型会将珊瑚礁视为另一种资本品（capital good），找出珊瑚礁没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它是一种公共财产资源），并继续使用直观的经济推理。我的评估则超出了这一点，认为每个区域经济都已嵌入生态系统网络，当然也包括珊瑚礁。

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之所以需要重新建构，还有另一个原因。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国家理所应当把这些资源视为便利设施。海滩、湖泊和公园为人们提供了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机会。由于缺少此类公共产品的市场，因此采取各种方法，让人们能够衡量这类资本品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以估算出人们对于资本品提供的服务应支付的费用。我认为，这种对自然资源舒适价值的重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大自然视为奢侈品的原因。世界银行发布的《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专门探讨了环

境经济学，并采取了这一方法。该报告指出各国首先通过传统方式发展，即投资于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只有当国家变得富有时才会收拾混乱的局面。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都充斥着这种观点。我的评估有一部分是对这种经历的回应，认为大自然不仅美丽，而且富有生产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她提供的服务。这就是为什么该评估会在解释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方面花费了如此多的篇幅。当然，就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们都明白这一点。只要问问渔夫、护林人或农民，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将当地的生态系统视为一种生产资料！

我认为重点的变化——从消费转向生产，又从生产转向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关注人类福祉和包容性财富的增长，而不是GDP的增长——是我的评估对公认的经济学的调整。

所以，我最后要对薛进军教授说，我们不应该把这篇评估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我没有能力提出新的理论，我只是站在了导师罗伯特·索洛和肯尼斯·阿罗教授的肩膀上。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索洛教授没有继续研究他的增长理论，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没有机会发表这篇评估！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不等式

薛进军：非常感谢，我明白了，重新包装和重新定向是您的经济学的两个关键词。但是我鼓励您继续您的研究并发展新的理论，以便我们可以用来分析目前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回到理论层面，我有一个关于您的生物多样性方程式的问题，即 N 、 Y 除以 α ，大于 G 和 S 。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衡量 α 和 S ，如何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取得平衡？您说左边是需求方，右边是供给方，那么我们如何调整并达到平衡呢？

此外，如我们所知，有许多可以轻松记忆和理解的指标，例如GDP和人均GDP。所以在您的报告或经济学中，您是否也想创建一个新的指

标，就像人均GDP或自然资本等之类很容易衡量和理解的指标呢？这也是我的想法和一点评论。

达斯古普塔：谢谢你的提问。正如你所说，该评估要求各国政府在国民核算账户中报告本国的包容性财富，而不是GDP，要牢牢记住包容性财富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存量的社会价值。应该将经济进步理解为包容性财富的增加（当然，要根据人口变化进行调整），而不是GDP或人均GDP的增长。原则上，即使自然资本存量有所下降，包容性财富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一年）增加。如果生产性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积累速度足够快，足以弥补自然资本的下降，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广为接受的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和贫困经济学曾提出，人类（经济）植根于大自然，但这一假设是建立在一种直觉之上，即只有用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取代自然资本才能实现经济进步。这一假设指导了经济实践。全球经济遵循的发展道路是不断开采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正处于一种救火状态。现在，自然资本岌岌可危，处于临界点，我们需要关注我们对大自然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大自然可持续地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出现的巨大差距。你刚才提到的影响不等式（Impact Inequality）是衡量某一时刻供需差距的指标。而如今的影响不等式所反映出的差距已表明，我们的观点需要改变。

在该评估中，我将人类对大自然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分解为三个因素： N （人口规模）、 y （人均GDP）和 α （大自然的商品和服务转化为在GDP中体现的最终产品的效率的数值指数），因此总需求是 Ny/α 。请注意，大自然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在评估中用 G 表示，而 G 值取决于生物圈的状态 S ，因此我们可以将供给表示为 $G(S)$ ， S 越大， G 值越高。所以，影响不等式为 $Ny/\alpha > G(S)$ 。



由于现在的影响不等式很大（我们正处于救火状态），现在广泛使用的“可持续发展”一词应该被理解为，需求（ Ny/α ）和可持续供应（ $\beta G(S)$ ）之间的最小差值应该降到零。要实现这一点，要么减少需求，要么增加供给，或者两者同时进行。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杠杆、制度改革和行为改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当今的讨论集中在 y 、 α 、 β 、 G 和 S 上，主要是降低 y 、增加 α ，同时想办法增加 G ——可能是通过投资 S （注意，这些讨论中不包括 N ！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说到）。这就是从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有一类政策杠杆直接针对 y ，旨在让自然资本适当变贵，这样我们对生物圈的需求就会下降。相关政策包括对自然资本的使用征税、设置配额以及建立专门的保护区等。这些杠杆将可同时提高 S ，从而实现可持续供应。此外，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变革来降低需求，例如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以提高 α ，降低 Ny/α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减少食物和水资源浪费等行为改变则是提高 α 的另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法是取消自然资本补贴。我在评估中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对自然资本使用的积极补贴约为 4 万亿 -6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3%-5%。

投资于大自然也可以直接增加可持续供应。开垦荒地是一类措施，通过减少污染促进湿地、河口和红树林恢复是另一类措施。基于大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直观的表达方式，即依靠大自然本身改善其健康通常比依靠生产性资本改善其健康更可行。对大自然进行投资只需要等待。在如今的荒地上植树和对荒地上的自然基础设施进行小的修复所需的财政支出，并不会比扩建导致荒地形成的道路网所需的财政支出更多。正如我们今天反复指出的那样，道路扩建带来的收益可能低于失去曾经的优质湿地的成本。自然友好型投资主要是为了等待植物、细菌和真菌网络的生长。此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通过开发新技术（如生

物技术）来提高 G 。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持续到 2030 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现在到 2030 年， α 必须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我所进行的评估发现，只有当 α 的年增长率是过去 30 年增长率的 4-5 倍时，影响不等式才会在 2030 年降至零！你可能会认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官员和顾问会在 2030 年检查这些目标是否可持续，但他们并不会。

那么 N 呢？它在影响不等式中扮演着与 y 一样强大的角色，但如今没有人谈到它。我所读到的关于 COP26 和 COP15 的讨论中并未提及人口因素，这令我十分困惑。联合国人口统计部门对目前到 2100 年的区域和全球人口进行了预测。你会发现，除了非洲，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数量略有下降，但非洲的人口将从目前的 10 亿增加到 38 亿。非洲的生育率约为 4.7，死亡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匹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收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如果非洲人民试图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提高 GDP，并且非洲人口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保持增长，你认为他们将如何应对？我认为这是非洲人民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一问题，尤其是非洲的领导人。这就是我在该评估中谈到非洲问题的原因。我希望能够清楚地表现我是从普通非洲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她的未来如此暗淡。非洲的富人会像其他地方的富人一样照顾好自己，而普通的非洲人将继续受苦。在不断缩小的生物群落中，人数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内部冲突，而向外迁移的努力则会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生育率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从而将 N 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排除。但 y 的组成也是如此，而且文化习俗变得非常快（想想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没有任何文化障碍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在贫穷国家中，孟加拉国展示出了大力投资计划生育和生育健康服务可以取

得的结果。那里的生育率目前刚好在人口替换率以下。相比来看，巴基斯坦的生育率则约为3.4。再比较一下他们的经济状况！（编者注：孟加拉国的GDP已超过巴基斯坦）

薛进军：感谢您的回答，我明白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您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从您那里学到更多东西。

林毅夫：进军和达斯古普塔教授之间的对话很吸引人。我发现达斯古普塔教授非常谦虚，他说自己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只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特别是他扩展了我们提到的财富的概念，延伸了财富的衡量标准。这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试图了解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当然还有世界财富的本质和原因。

众所周知，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仍使用GDP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而该衡量标准太狭隘了。达斯古普塔教授希望我们扩大衡量标准，扩大财富的范围。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定量和定性的维度。很多时候，如果扩展量的维度，将会导致质的变化。由于我们一直使用GDP这个狭隘的衡量标准，因此尽管我们努力提高GDP，却导致了国民财富的下降。

我认为达斯古普塔教授提出的关于财富的新理解，能够维持甚至扩大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其结果将是革命性的。虽然您谦虚地说您的理论或分析方法并不是新的，但其研究结果将是新的，具有创新性。

下面我邀请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加入对话。

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徐晋涛：达斯古普塔教授，我原本有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个是，您这项评估的议题是“生

物多样性”，但是您经常说到的词语却是“大自然”，请问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

原本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想询问您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现状的看法。不过进军刚才已经提了这个问题，您也给出了很棒的答案。您提到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问题和发达国家的便利设施问题，这一观点很睿智。

现在我想再提一个新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是两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比如候鸟迁徙、跨边境的森林火灾等。对于单个国家来说，仅仅试图增强民众意识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这么做可能仍不够。有许多议题需要全球联合行动。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保护它的森林，那么它就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木材，这样其他国家的森林管理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差，森林砍伐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得更好。渔业问题也是如此。中国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现在我们从热带国家进口大量木材，进口量显著增加，所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评。我们出台了禁捕的政策，却在全球的公海捕鱼。因此，生物多样性确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仅仅一、两个国家做得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以全球视野看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请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达斯古普塔：感谢您提出了一个绝妙的问题，让我可以对一些事情进行澄清。在评估中，我没有交替使用“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这两个词，而是使用“环境”、“生物圈”和“大自然”。因为如果我在600页的文章中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术语，那会让读者感到厌烦。

生物圈是一个存量；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的一个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特征；而生态系统则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这篇评估的标题提到了“生物多样性”，但评估本身是对自然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e) 的研究。生态系统是构成大自然的生产性资产。

我将关注点从“生物多样性”转移到“生态系统”的影响之一是避免在评估中讨论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反,该评估讨论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讨论了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

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非常深刻。确实如此,这些是自然界中出现的一些最大的问题,它们是全球性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自然是可流动的。所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加勒比地区,而船只在北极造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到南极,因为海洋和风一样一直处于循环中。您所言完全正确,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么多,就是控制局部外部性(local externality)。

例如有两块相邻的土地,一块用于生产咖啡豆,另一块则是一片森林,这两块土地能够互惠互利。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当地的问题,比如管理沿海渔业,管理当地的森林等。这些都是确信无疑的,但我们不要拘泥于其全球公共产品性质。

我之前提到过,减少食物和水资源浪费等行为变化可以提高影响不等式中的 α 。我注意到,提高 α 的另一种方式是取消自然资本补贴。我曾提到,目前全球每年对自然资本使用的积极补贴约为4万亿-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5%。尽管这个数字十分庞大,但并不包括人类通过允许资源开放利用来开发公海(提供鱼类资源和海运航道)等全球公共资源而支付的被动补贴。公海属于每个人,这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一人,也因此没人会有保护它的动机。有必要建立一个跨国组织对公海的使用进行监测、管理和收费,所产生的收入可用于支付保护在各国管辖范围内的泥炭地和热带雨林等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这笔费用将是“生态系统服务费”的延伸,而收取生态系统服务费的做法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系统。

“二战”结束后,各国通过设计马歇尔计划以及创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跨国机构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展现了无穷的想象力、勇气和胸怀。不过,目前还没有针对生物圈的全球公共产品设立相关跨国机构。由于COP26和COP15都不太可能提议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因此每年未能针对公海运输和捕鱼征收数千亿美元的租金。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可以将这些收入支付给那些拥有热带雨林等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停止对雨林的破坏。

现在,在国家管辖范围内鼓励甚至强制要求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的做法越来越多。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这一制度,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我在评估中建议应将这种做法扩展到全球公共产品,如热带雨林等生物群落,当然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机构。

据我所知,COP15不会讨论建立国际机构来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因此我感到非常失望。毕竟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行。

林毅夫:回答非常精彩,晋涛,您还有其他的评论和问题吗?

徐晋涛: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回答非常精彩。我认为您的回答所传达的信息是,经济学在这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悲剧中仍然有效。我们可以使用定价方案,可以使用PES(供给的价格弹性),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全球机构,大概就可以使用所有这些经济学工具。

中国的“绿就是金”原则与实践

林毅夫:接下来我邀请张林秀博士发言。首先,我想问张博士一个问题,在您成为“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EMP)主任之前,您已在中国拥有广泛的研究经验和研究背景,现在您领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中国的合作中心。在谈论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与《达斯古普塔评估》产生共鸣时，您无疑处于非常独特的位置。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观察吗？

张林秀：通过参与此次圆桌讨论，我学到了很多。达斯古普塔教授说我们缺乏保护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制度，我明白我们距离创建全球机构还有一些路要走，但我知道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政府对生态和环境问题非常关注，并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作为关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福祉的长期战略。所以我们才会谈到“绿就是金”的概念。中国人喜欢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认为这确实与我们讨论的内容产生了共鸣，它强调了我们的经济植根于大自然，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就政治意愿而言，它需要与雄心壮志、协调合作和各种工具等其他要素相结合，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在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决策主流方面，中国一直在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进行试点项目，例如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这一项目是由联合国统计司指导，中国国家统计局实施的一次很有前景的尝试。它在国家层面启动了生态系统核算的试点测试，这是帮助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纳入国际主流决策机构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框架下，我们还与中国生态环境部密切合作，开展有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的短期项目，其对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评估可以支持更好的决策过程，将农业领域的外部性得以内在化。

我认为这些案例评估的优点之一是它们使用了情景分析的方法，这使我们能够看到现阶段制定的政策不仅会影响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还会影响远至2035年甚至2050年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当代和后代的

价值观和福祉考虑在内，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注意到中国还有其他专业人士正在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例如，其中之一是“增长、经济和生态”产品，这个概念将GDP和GEP结合起来，建立“绿就是金”的框架，也就是将经济发展嵌入大自然之中。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有前景的工作。我相信从这些案例或试点中得出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把这样的实践扩展到我国更广泛的区域。

同时，我希望通过南-南合作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这些做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将对大自然的评估纳入主流，正如《达斯古普塔评估》所期望的那样。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联合国环境署如何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

林毅夫：我还想问一个关于您的机构在做什么的问题。《达斯古普塔评估》呼吁采取集体的和持续的行动来改造体系，这也是我们使用大自然的基础，尤其是要改变金融和教育系统。那么，您能否与我们分享您的机构为了应对目前的难题，加速促成革命性和系统性的变革，制定了什么政策和计划？

张林秀：从联合国环境署层面，我们提出了三个环境挑战：一是气候变化，二是生态系统退化，三是污染。

正如达斯古普塔教授所说，环境问题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需要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丧失以及气候变化和污染，关乎8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不是关于目标的可持续性，而是关于目标本身，这让我们更难在减贫、饥饿、健康、水以及城市和气候等方面取得进展。

因此，鉴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以及空气和水污染的相互关联性，这些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因此，目标的制定、指标、承诺、



关键环境中的机制、公约及其实施需要保持一致，才能协同作用，更加有效。

基于这种精神，关联法（nexus approaches）对于变革性行动至关重要。因此，在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之下，自 2016 年开始，我们正在实施一项关于气候、生态系统和民生的旗舰项目。我们注意到，当你搜索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或民生时，会发现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和行动；但是当你把它们组合起来，尤其是将这三个元素合在一起时，就没有多少相关的研究和行动了。这就是我们开展该项目的原由。

自 2016 年以来，我们的项目已经展示出用关联法评估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目标的情况。保护这些国家的生态系统并改善民生是可能的，也是有前景的，因为我们明白，当生态系统得到保护时，它将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这将提升民众的福祉。

我们清楚：每个人都可以在转变社会和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作用，迈向可持续的未来。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互补的和关联的作用，连结各领域带来即时的和长期的经济领域的转折性影响。我们也知道个人可以通过改变饮食、旅行习惯，避免浪费食物和资源，以及减少水和能源消耗等方式促进变革，而这些都可以通过改变行为和加强认识来达成。

当然，企业创新和知识共享将在向可持续的未来转型过程中创造出新的联结、经济可能性和机遇。我认为我们拥有充满前景的良好实践，但前路仍不乏挑战。

GDP 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如何衡量包容性财富

林毅夫：我再想向达斯古普塔教授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将自己称为发展经济学家，总是以行动为导向。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的 GDP 增长在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中还起作用吗？第二个

问题是，正如您在评估中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步骤以衡量包容性财富？

达斯古普塔：我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GDP 将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果试图了解或掌握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规模，GDP 仍是很有价值的衡量标准。

当然，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管理问题，GDP 仍将是必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GDP 的问题存在于评估方面和跨期项目上，即评估国家和国际政策所呈现的宏观经济未来的可持续性。GDP 的主要问题是它没有考虑到折旧。这在过去或许并不重要，比如 70 年前，当时各国使用只计算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非不合理，因为人们可以使用粗略、现成的折旧数字。

自然资本则大不相同。生态系统的折旧是高度内生的，一年内可以从完全不影响生态系统的 0% 到破坏生态系统的 100%！这就是我在评估中建议采用基于资产的国民核算方法的部分原因。各国应该制作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一点也不相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记录包容性财富。

此外，自然资本所附加的价格不会公布，在某些项目上会出现巨大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包容性财富视为一个指标是无法实现的，但它指出了改善国民核算账户的方法。该评估的目的是建议统计部门每年编制一份国家自然资本存量清单，应邀请生态学家加入统计部门，以便对国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比如对于渔业而言，需要跟踪鱼类资源的自然数量，诸如此类。每年年底，一些生态系统的质量会有所改善，或者范围会扩大，而另一些生态系统则会恶化（就是贬值）。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因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作为参考（例如需要对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投资）。

不幸的是，大多数国家似乎只有一份很初级的自然资本存量清单。几年前，我和肯尼思·阿罗教授、劳伦斯·古尔德（Lawrence Goulder）教授发表了一项研究，估算了中国、

印度、美国、巴西和委内瑞拉这五个国家的包容性财富随时间的变化。我们想看看在所讨论的时间段内人均包容性财富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我们竟然找不到鱼类资源的估算值！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关于鱼类存量的数据。私营公司拥有自己的资本存量清单，但国家居然没有。这一点需要改变。

好消息是，一些国家正在增加自然资本核算账户。你比我更清楚，中国正在努力重建国民核算账户。英国在自然资本核算账户方面十分领先，在适当的时候，自然资本核算账户将作为主要账户的附属账户，而主要账户将继续以 GDP 作为根基。那就好，因为我的想法并不是要抹杀 GDP，而是希望用体现公民福祉的方法来补充 GDP，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评估经济计划的可持续性。

环境经济学家常常忘记 GDP 是为了满足短期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需要而设计的。整个凯恩斯主义体系建立在 GDP 与就业之间理所当然的联系之上。后者是国家福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我希望宏观经济学的同事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将就业与经济产出脱钩，这样政府就不必为了防止就业下降而敦促人们消费了！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我的这项评估无法涵盖。

结语评述

林毅夫：今天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增强了我们对您这份评估报告的理解。当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指导。我喜欢凯恩斯所说的：“无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一旦我们有了好的想法，就可以扭转局面。否则，世界可能会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恶化。

从您的报告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本性是寻求生计和福祉。我们有义务修复生物多样性，挽救生态圈等自然资产，改善大自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

需要改变行动理念和财富目标，即不仅仅盯着 GDP，还要为此采取全球联合行动。

即将举行的 COP15 将是一个向全世界传播您的想法并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因此，我希望这次圆桌对话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

在结束本次圆桌对话之前，我想请所有与会者做一句话评述。这次请张林秀博士先发言。

张林秀：我认为我们对《达斯古普塔评估》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我想提出另外一点。我想在行动层面提醒大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女性赋权。因为女性是革命性变革的杠杆和驱动力，是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跑者。

徐晋涛：在这次对话中，我们似乎在讨论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所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如全球共同的悲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发展中国家的等问题等。所以，我们很乐观，可能只需要沿着达斯古普塔教授刚刚指出的方向更加努力地工作。总的来看，所有潜在的解决方案都是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薛进军：非常感谢林教授和达斯古普塔教授的主持，以及精彩的回答和评论。我认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但这还不够，因为今天我们提出了很多新问题，达斯古普塔教授也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概念和想法，所以我建议以后有机会继续讨论。

今天早上，我联系了《自然》(Nature) 杂志的一位编辑，问是否可以将我们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讨论或见解写成一篇文章发表，编辑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可以合写一篇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如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文章，以为生态系统保护做出更多、更切实的贡献。

林毅夫：很好的建议。当然，我们应该继续携手共进，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达斯古普塔教授，现在轮到您做最后的总结。



达斯古普塔：我最后想说的是拜托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经济的附属品，她应该是经济逻辑的核心。

林毅夫：非常好，这和我们常说的“青山绿

水就是金山银山”非常相似。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感谢各位的参与，期待有机会再合作，为更美好的世界贡献我们的知识。

万众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力的源泉

埃德蒙·费尔普斯 (Edmund S Phelps)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繁荣》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代表性学者

万众创新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拐点

《活力》是我2013年所著《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的续作,书中所阐释和验证的观点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不同。标准经济学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对经济而言完全属于外生变量。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认为,科学和航海发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企业家们主要是将科学发现带来的技术进步应用于商业。在标准的经济理论中,没有考虑谁能构思出新事物,继而对该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原生的自主创新是不存在的。

《活力》一书提出的基本前提是:无论科学家是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社会各行各业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去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并进行创新;并且,现代社会应当允许并鼓励人们去将这些新构思付诸实践,去创造和尝试它们。尽管熊彼特式的创新仍然在发生,但并不占主导,在创新水平高的国家,大多数创新都是自主的,萌发于该国大众的原创性和创造力。

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应拥有创新所需的活力以及将创新融入经济的意愿。这种活力的来源和回报取决于参与国家经济的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人们是否愿意创新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构想相关。我在《大繁荣》中注意到这一点,在《活力》再次强调并做了验证。

我提出的“大繁荣”现象也是基于前人的研究。经济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他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经济腾飞之后,往往接下来会伴随一段时间的倒退,直到19世纪才出现罗斯托所称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比如1815年前后的英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有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此后,很多国家都忙于引进和借鉴领先国家已经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例如荷兰和意大利等国靠引入英、美、法、德的创新技术推动了本国经济增长。

那些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国家,不仅保持了多年的经济强劲增长,而且完成了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贸易到生产的转型,变成了现代经济。新的城市大量涌现,新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现代的诞生》一书中生动地刻画了英美和欧洲大陆一大批普通人所展现出的现代生活特有的原创性。

创新源于新型人生观

创新潮暴发的原因是什么?我在《大繁荣》中给出的答案是——新型人生观的出现。这是一种影响了整个英国的新的人生态度:走自己的路,抓住自己的机遇,正如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

本文根据菲尔普斯2021年7月30日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的圆桌对话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更斯所说“掌握自己的人生”。这种精神催生了英美前所未有的自主创新潮。最重要的是，这种新人生观激发了经济中每个个体的想象力：有人在构想新的产品，有人在构思新的生产方式，还有人在探索如何为现有产品打开新的市场。所有人都尝试用新方式思考，用新方式做事。

这并非一个由商人和企业家主导的交易型经济，而是一个基于现代社会的创新型经济，其核心是社会能为个体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鼓励人们去构思、创造、推广、使用新的产品和工艺，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创新潮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回报：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收入的提高，经济活动的收益总量大于损耗，并且，随着衣食住行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健康长寿。

英国的记录显示：国民收入曾连续几个世纪起起伏伏，还曾于1750年-1800年间严重下挫，但最终在进入创新经济后大幅攀升，与人均劳动产出的增速相当。同时，人们的休闲方式也愈发多样化，包括去剧院、运动或者酒吧。这也给社会公共事业带来无穷的益处。随着收入上升，政府可以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上加大投入。

有活力的经济还带来了巨大的非物质回报。即使在缺少活力的经济体中，学习新事物、与他人交换信息，哪怕只是保持忙碌工作的状态，也会给人带来满足感；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民众收获的非物质回报给他们的生命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在现代经济中工作的大部分人，他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将自己的新想法付诸实践，并且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很多人而言成为一件充满吸引力的事。

为什么这种新的经济和工作方式有如此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什么这种活力在一些国家存在，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不存在？

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这种新现象，但很少去分析背后的原因。为什么面对成功的不确定性，有些国家的人仍乐于创新，而其他一些国家

的人不愿意？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构建出有富有活力的社会，而其他一些国家却做不到？

我们最初可能认为巨大的物质回报推动了创新经济的崛起，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只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出现。我在《大繁荣》中提出，又在《活力》中得到验证的解释是：国民更现代化的国家更能保养一个创新的经济。

人与人不同，即使假设所有国家都能从现代经济中获得同等的非物质回报，一些国家的民众会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会更多地被现代经济吸引；对另一些国家的人而言，这种回报没那么大吸引力。换言之，国家的关键区别在于民众的态度。

活力理论的验证过程

关于活力理论的验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由于还没有关于自主创新的时间序列模型，所以我和我的团队构建了一个多国背景下不同创新类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此评估自主创新的时间序列。这个模型能够让我们比较不同国家间的自主创新，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自主创新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

其次，在《活力》一书中我们也搜集了不同国家民众的态度方面的数据，以此来判断不同国家民众现代价值观的差异（比如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欲望的不同等）是否比各国制度的差异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更大。

最后，我们的调研验证了活力的存在性。关于国家间经济表现的差异，大多数研究都把研究关注点放在经济体制上，而几乎不谈价值观。事实上，在那些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人们热衷于获取与追求成功，努力创造繁荣与兴盛，而在缺乏活力的经济体中，人们往往过的不那么快乐，无聊且沮丧。

再谈一点很多人关心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

在西方国家，澎湃且持续的创新潮已经基本落幕。除了信息革命的那十来年，为什么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西方经济就陷入了半停滞呢？答案可能是民众活力的减退和正确价值观的丧失使

创新萎靡不振。

我认为，西方国家创新精神的来源是价值观，而这种现代价值观已大幅消退。当然我的这一观点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论证。



创新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 要释放和保护每个人的创造力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费尔普斯教授是经济学界的泰斗，我在美国读书时，就曾经读过很多他的著作，受益良多，因此他也相当于是我的老师。今天有机会参与基于他这本新书的对话研讨，对我来说十分荣幸。

首先恭喜费尔普斯教授的又一力作出版。这本新书可谓恰逢其时，因为世界正面临诸多挑战，可以说是新旧挑战叠加。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过去，很多伤痛尚未痊愈，另一方面，人类正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对经济再次带来打击，人类面临健康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对于不同国家又是不均等的。不仅如此，各国还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有些国家进展顺利，有些国家明显掉队。人类还有气候变化这个共同的重大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创新来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和探索激发创新与保持活力的方式方法。

这本书对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今年刚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也实现了全面脱贫目标，正在开启新征程，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中国百年华诞之际，即2049年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这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工业化提高生产力。这并不容易，因为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中国会遇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很多挑战。

比如，中国中等收入人口有4亿，到2035年之前又会增加4亿，2049年前再增加4亿。如此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中等收入人群向往好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并且兴趣广泛。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只要是有益的，都应该得到满足。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兼顾气候变化和资源有限性带来的挑战。

这本书传达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只有通过持续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的蓬勃发展。

如何促进这种创新？本书提到，刻板印象认为，推动技术从一个前沿突破到另外一个前沿的必须是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这个技术创新群体诚然重要，但并不构成所有创新的主体。构建一个创新社会还需要依靠每个公民的创造才能，需要万众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如此。

这本书的论证也启发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

本文根据林毅夫2021年7月30日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的圆桌对话上的点评整理。

才能释放每个公民身上的创造天赋，实现万众创新？为此，我们需要塑造一种价值观，即人们知道创新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应该尊重人人皆有的创新能力，这是其一。

我们还需要创造一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意见和做事方式。只有在这种文化下，每个公民身上的创新能力才能被释放出来。

当然，我们的体制也需要起到对创新的鼓励、帮助和保护的作用。

总之，这确实是一本对全世界都颇有意义的书，相信会像菲尔普斯教授的另一本力作《大繁荣》一样让大家受益良多。《大繁荣》树立起我们构建繁荣社会的信心，而这本书又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目标的道路。



创新的关键理念与举措

埃德蒙·费尔普斯 (Edmund S Phelps)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

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薛澜

清华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

创新要注重教育，不要过于担心垄断

薛澜：我自己也研究创新，重点关注创新政策。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创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这项工作开展得很有价值。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活力》这本书中学到很多经验，了解政府如何能够更好地激励创新，在一些方面做出切实的改进；如何让价值观、文化、体制等因素以和谐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最大程度推动创新。

请问费尔普斯教授，在推动创新方面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建议？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哪些方面还能进一步改进？

埃德蒙·费尔普斯：非常感谢两位对《大繁荣》和《活力》的美言。据我所知，中国读者对这两本书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并且对书中提出的目标和愿景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此我深表感谢。

关于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切实的举措来提升创新水平，我不再赘述中国当下的创新规模，这显

而易见。我们主要探讨进一步提升的方式，即如何推动更快更有效的创新。回答这个问题时，我的劣势在于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林教授可以作证，我在中国待过很久，考察了很多行业，并对他们的创新能力印象深刻。基于这些观察，虽然我也不知道有哪些“芝麻开门”般的诀窍能瞬间释放所有创新潜力，但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能够做些什么。

我常讲的一个看法是，要想提升创新水平，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给学生们提供发现和创造的机会，还要给孩子们树立榜样。

我小时候常常翻看我父母书柜里的书，其中很多是关于探险的。现在似乎没有几个国家会鼓励孩子们去多读探险故事，我可能有失偏颇，但这个问题切实存在。我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孩子们对探索创造和创新的兴趣。尽管这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可能让创新水平在来年就迅速提高，但我确实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讨论。

薛澜：您刚刚讲的正是中国当下的关键问题。如您所说，孩子们需要有足够的机会去探索

本文根据三位教授2021年7月30日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的圆桌对话上的对话部分整理。

和发现。但是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都忙着应付考试。中国的高考制度深刻影响着整个教育体系，孩子们需要从小学开始就为高考做准备。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改革。

现在请林教授谈谈政府可以开展哪些改进的举措。

林毅夫：读了《活力》之后，我认为中国需要改进自己的创新政策。正如费尔普斯教授所言，中国的读者高度重视他的著作并获益匪浅。中国肯定是有进步空间的。

根据这本书所写，也根据我和学生的互动感受，我同意创新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否能蓬勃发展则取决于环境。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环境，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尝试和实施。过去有很多相关的至理名言，比如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不允许人们失败，就没有成功的基础。我们需要让这些智慧再放光芒。有人尝试新的东西，即使失败了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应该包容他们的失败。不要惧怕失败。

埃德蒙·费尔普斯：是的，不要惧怕失败。

林毅夫：也不要藐视失败。这是其一。

说到学校和政府层面，我们有句成语叫“百花齐放”。我们要允许并鼓励人们尝试新的事物，保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创新潜力。

如果你有创新能力，你由此获得成功，这是好事，不过也可能有副作用。比如，如果你过于成功，就会形成垄断，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损失。但是我们不要在这点上杞人忧天，如果真的出现垄断，势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那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提前避免。如果我们总想着避免垄断，那就会扼杀人们的创新能力。

这是我的观察，中国可以从以前的至理名言中重新汲取智慧。我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提升创新水平，并在今后几年实现有活力的经济增长。

埃德蒙·费尔普斯：林教授，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您讲得很清楚，我只做几点补充。创造新产品、开发新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人们应享受、欣赏这个过程，认识到有创造力的生活是精彩的，而不去回避。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关于垄断问题。如果一个人获得巨大的成功，超过了同行业其他所有人，那他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垄断。不过政府可以介入打破垄断，或者另一个更强势的公司会出现，取代并成为新的垄断者。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限制大企业的发展，不能总想着通过干预来避免垄断。竞争很重要，有能力打入一个行业很重要，尤其是知名老牌企业所在的行业，这就是竞争。中国不应惧怕竞争，而要拥抱竞争，这与中国的基本原则和思想理念不冲突，是有益的事。

林毅夫：确实如此，我完全赞同。创新能给创新者带来满足感，这就是一种重要的回报。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可固然重要，但是创新者在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中收获的自我满足感和充实感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回报。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再补充一点。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大公司能产生新思路，其实一个新的想法也可能是一颗种子，然后萌发成为一家新的公司，因此，很多人都很享受创业。而且从这个角度看，竞争会很有助益，老牌企业需要与新兴企业竞争，这对生产力提升和资源配置都有好处。

创新的普及与引进

薛澜：您说得特别好。创新和创业紧密关联，很多新点子是创业者提出的，接着公司就逐渐由小做大了。

关于创新这个话题，我还想请二位谈谈前沿创新的突破与普及应用的关系。世界银行几年前做了一项有关中国创新的研究。他们发现，尽管中国政府这些年来高度关注前沿创新，但成熟技



术的普及在中国还做得不够，在一些产业中，可能在同时使用几代技术。

请问二位，在整个创新的过程中，创新的普及有多重要，以及我们如何进一步使前沿创新得到普及？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同意，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在国内和全球扩散普及非常重要。很多年前，我和理查德·纳尔逊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创新扩散问题。我们在论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能吸收国外或邻国的好理念、好技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创新就传播得越快越远。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了国民教育水平。几十年来，面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国展示出强大的学习能力。而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众多人口，如果能让全体中国人都关注创新，鼓励他们产生新想法，潜力是无穷大的。

林毅夫：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非洲国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肯定落后于发达国家。尽管存在巨大的鸿沟，但这也意味着技术扩散普及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可以去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如何引进、如何运用就至关重要。

成功的技术引进消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创新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要想有竞争力，就要发展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产业，从而发挥低生产成本优势。如果禀赋结构升级，则需要采用新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同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就可以引进消化与自身发展程度相容的技术。基于这一原则做选择就可以从后来者优势中获益。如果不遵从这一务实原则，有时就会好高骛远。如果在收入水平还很低、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的时候就想要马上发展前沿科技，当然勇气可嘉，但大概率会失败。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水平出发来引进

消化吸收新技术，这一点非常重要。

薛澜：林教授刚刚的发言让我想到，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提升取决于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在努力思考并实践创新。这要比一个新发现本身重要得多。之前也提到，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如果人们都能参与创新，形成的总效果将是巨大的。

林毅夫：我再补充一点。我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做技术借鉴的机会。技术借鉴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因为这项技术是新的，即使是国外借鉴过来，我们也需要进行很多调整，使当地条件与其互相适应，才能让这项技术在本土发挥最大作用。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借鉴和技术适应也属于一种创新。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创新与经济复苏

薛澜：最后一个问题，各国都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所以经济恢复的前景更为明朗。两位经济学家会如何建议政府刺激创新，走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下行呢？

林毅夫：我们首先要抑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需要依靠技术，依靠疫苗接种。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确保民众接种疫苗，越快越好，这样才能让生产和生活恢复正常。在那之后，我们需要激发公民创新和创业的潜力。假如政府能够创造一个让创新的潜力得以释放的环境，那么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实现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改善银行体系来为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使银行更愿意为新公司融资，尤其是那些有新想法的公司。现在的一大难点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跟不上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关注小型银行，或者是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这样做会对创新有所帮助。

另外一点我们刚刚还未提到的就是专利。

专利保护很重要。如果得不到专利保护，小公司总会担心自己的原创技术遭到剽窃，那么肯定在推出新产品时犹豫不决。但是专利共享也很重要，在慈善社会中，专利可能会由于公益原因

而进行共享，新冠肺炎的防护手段就是一个例子。一些公司在对抗疫情方面有新发现，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有了一定回报，我认为现在他们可以与其他各国多做分享。



共同富裕，须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共同富裕”是当前的热词。何谓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路该如何走？社会上有不少讨论。

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吃过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亏。在“大锅饭”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体系低效。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当前，一小部分人不仅财富来路可疑，而且高调炫耀，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杀富济贫”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承担企业失败的风险，社会舆论容易被“幸存者偏差”所左右，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容易忘记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实际上，成功企业家的高收入是以更多失败企业家的损失为基础，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层面上，让潜在的企业家打平他们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成本。

笔者认为，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托底”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民众摆脱对衰老、失业、疾病和匮乏的恐惧；“提升”就是提升民众的收入能力，让所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

的收入。社会保障不仅是社会福利，也可以促进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它降低了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民众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从事有一定风险、但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活动，比如开个小店、发明一项新技术，或者开办企业等等。提升民众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渔”，让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获得更高的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下来，而是要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上去。

这样的目标，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我国古代社会就有社会保障机制。南方地区长期存在各种族田，为本族成员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开始有政府承办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公平观是建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是轴心时代先哲们所秉持的公平原则，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亚里士多德都相信，一个人得到的回报应该与他的能力和努力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贤能主张，认为选贤任能是分配政治职位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所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本文为姚洋2021年8月30日在环球网发表的文章。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次分配的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计划经济时代强调按劳分配但没有严格执行，而是以“大锅饭”为主。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放弃“大锅饭”，实行按要素分配，劳动、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按照它们的边际贡献获得报酬。从理论上讲，按要素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宽泛的形式，因为劳动力之外的各种要素说到底都是劳动积累的产物。按要素分配不仅可以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可以让市场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指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

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按要素分配要尊重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时也难免受到能力和努力之外因素的影响，必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和再分配对收入和财富进行二次调节。但调节不是简单的“削峰填谷”，把从企业和高收入者那里收到的税收分给低收入者就了事，而是精准地提高民众的收入能力，这样才能获得持续的共同富裕。

在今天的中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升收入能力的关键，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时代已经结束。

但中国的教育水平分布不均，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已经趋于普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才刚过初中。教育的阶层固化也日趋严重，子女教育水平与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性已经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家庭的教育投入出现分化：中等收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鸡娃”和焦虑成为常态；低收入家庭出现躺平、放弃孩子课外辅导的状况。

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笔者认为，实行小学和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小学生的无效竞争，也有利于政府教育投入的均等化。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吸引优秀教师长期扎根农村学校，也是实现教育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次分配是厉以宁先生30多年前提出来的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则。在这方面，一些企业家做出了表率，他们积极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是慈善捐款的主体力量。但是，就促进共同富裕而言，三次分配只能是锦上添花，因为其数量毕竟是有限，它更多的是体现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而不是强制性的再分配。最适合三次分配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救助社会保障无法触及的贫困领域、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资助以及引领社会的文化艺术事业。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余森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我们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今天请允许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此次会议精神的学习体会。

先分享第一点，为什么要促进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是我们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体现。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促进共同富裕，跟新发展理念里面的协调跟共享紧密相关。协调包括三个方面的协调，城乡方面的协调，我们要保证城乡收入差距不要太大，城乡收入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区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它要协调共进。各个行业它的收入差距不要太大。当我们讲到协调的时候，跟共同富裕是紧密相关的。

新发展理念的第四点是共享。我们今年已经实现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下一步我们要转向乡村振兴，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二点，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跟艰巨性。

回顾70多年的发展史，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从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建立起一个门类齐全、种类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城乡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人民的幸福度在不断提高。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标是解放跟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在这个阶段中，一个客观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城乡的收入差距，或者行业的相对收入以及区域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的扩大。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我们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大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中，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在下降。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差不多是3.5倍，现在是下降到2.5。行业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东部发达地区跟西部欠发达地区，差距也逐步的在缩小。

反映我国收入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也不断在下降。

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它的基尼系数下降的话，代表着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区它的经济越趋于平均，或者说财富的分配程度更加平等。我国在2020年的基尼系数只有0.41(41%)，考虑到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话，那么这一个基尼系数在国际范围内来讲是比较低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体现了我们一直在向共同富裕的路上迈进。

第三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要正确认识好效率跟公平的关系。当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两条腿走路，强调两手都要抓，公平和效率都重要，一个也不能少。强调效率、强调公平，就是要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它不是单一的、绝对的平均主义，相反，它是分阶段、分步骤来实施。

我们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系统工程。什么是初次分配呢？其实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换言之，我们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目标就是要强调效率，强调把蛋糕做大，这是初步的分配。

然而，光有初步的分配是不够的，我们也要强调再次的分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再次分配呢？其实就是发挥政府的力量，强调再次调节，主要是通过我们平时所采用的一些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包括公共支出，包括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工具来实施。当然有时候也辅之以货币政策来实施。

我们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先进的地区要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的东部沿海地区要帮助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实施我们

的国家战略，振兴东北，援助西北，扶持革命老区这样的机制，来帮我们实现再分配的目标。

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次分配，它的核心和要义其实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

如果说初次分配讲的是市场的力量，再分配讲的是政府的力量，那第三次分配它讲的是道德的力量。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倡导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鼓励先进的人们来帮助后进的人们。我们要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来帮助后富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

具体来说，应该如何落地实施第三次分配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是从税收方面的改革，第二是慈善捐献方面的改革。我们强调共同富裕，目标就是要实现勤劳致富，实现创新致富，不是坐以待成这样的一种形态。

我们可以考虑通过税种鼓励老百姓勤劳致富，而不是通过代际的转移，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我们实现共同富裕。

在某个成熟的程度上，可以考虑征收房产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第三次分配强调捐献和慈善。一是进行捐献前的免税，二是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捐赠，三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使一部分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愿意进行捐赠。

总之，在十四五规划，乃至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促进共同富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在 2000 年 -2010 年的十年间，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64%（2000 年）降至 49%（2010 年），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2010 年后消费占比有所回升，2019 年升至 56%，近期呈现相对平稳的走势。但与别国相比较，这一水平仍然较低，低于美国（82%）、英国（84%）、法国（78%）、日本（75%）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72%）等发展中国家。

消费占 GDP 比重的指标为什么重要？我认为这涉及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去年，我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消费相对疲软，今年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即消费不强劲，这就导致我国生产者价格非常高，消费者价格比较低，很多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

如何看待消费占比较低这一现象？经济学界其实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确实应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凡是依赖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经济、金融危机。

我个人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是，消费占比应该处于相对恰当的中间值，即重点不在于争论消费能否驱动经济增长，而是需要讨论在整个经济中消费和投资处于怎样的比例是相对恰当的。简单来说，如果消费过度、投资不足，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消费不足、投资过度，最终很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因此，维

持恰当的消费比例是必要的，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消费相对疲软的背后：收入分配不平等

过去很长时间，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消费相对疲软。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国民经济增长，但我认为，过去消费相对疲软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不平等”。

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我国基尼系数（Gini Index）从 0.37 上升到接近 0.48，此后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基尼系数（0-1）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虽然过去十余年，基尼系数走势呈平缓的上下波动，但整体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PC），通俗来讲就是收入中有多少比例用于消费，剩余部分用于储蓄。一般经验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当一国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时，高收入群体拥有很高比例的社会财富，但消费比例并不高；而低

本文根据黄益平在 2021 年 9 月 24 日的浦山讲坛第 27 期“解析共同富裕：内涵与实现路径”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收入群体有很多消费需求，但受到收入不足的制约，消费水平有限。这就会导致一国总体消费疲软。

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社保体系不完善，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大等。有学者测算，如果放松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限制，给他们城镇户籍，即使保持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支持因素不变，人均消费水平就可以提高 27%。我们之前做过计算，平均来看，一个城市居民的各项消费开支约是农村居民消费开支的 2-3 倍。因此，农村居民基数仍然较大、城镇化率不高的情况确实会使消费增长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会影响消费，也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从这一角度看，当前讨论共同富裕非常重要。

“共同富裕”四个字，我认为是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常说经济学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求得均衡，“共同”就是要注重公平，“富裕”就是要注重效率，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三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我们讲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导的分配。需要强调的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即怎样更好利用金融市场改善收入分配。

支持共同富裕，金融部门能有哪些作为？我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决定；三是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

第一，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发展是

最有效的反贫困手段”。中国到 2020 年底实现了近 1 亿人脱贫，在扶贫脱贫期间，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政策。事实上，一国最有效的反贫困手段就是快速发展经济，这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发展相对稳定，客观来看，金融体系支持经济增长应该说非常有效。1979-2018 年我国 GDP 平均增速为 9%，其中前三十年（1979-2008 年）平均增速为 10%。金融体系出现了不少风险因素，如银行不良资产，但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合著的《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评价道，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总体上非常成功，金融也做出了贡献。

我经常关注的一个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其含义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这一指标约为 3.5，金融危机后至 2017 年，ICOR 增长近一倍。简单来说就是在过去十几年，生产同一单位 GDP 所需的新增资本投入翻了近一番，这意味着我国金融效率在下降，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减弱可能有关。

自 1978 年起，中国金融改革几乎是白手起家，花费了很大力气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具有“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三个突出特征。ICOR 上升说明，这一套金融体系过去可以有效支持经济增长，但现在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日益减弱。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就会出现；如果经济不能实现持续增长，那么共同富裕也将很难实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转变，要求金融体系也要转变。中国已经从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很快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的发展差别是什么？是中国要从过去粗放型、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走向集约型、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



金融体系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金融创新、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改革等。其中，金融能否支持经济创新涉及到金融结构的调整，要求更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要求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转变业务模式，由过去简单支持粗放式的经济活动转为支持创新活动，比如通过数字金融更好地评估创新风险和回报。

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对实现共同富裕而言是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如果金融模式不能及时转变，经济增长将很难持续，共同富裕也就很难实现。

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当前居民收入占比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劳动报酬收入仅占 GDP 的 47.5%，美国为 53.6%，这和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要素没有真正得到同市场风险相匹配的市场回报相关。因此，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金融回报，尤其是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例明显偏低，这从根本上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但很多储蓄都存放在银行，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无论是活期、定期收益都不高，这与多年来金融体系“管制多”的特点、整个存贷款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有关。如果未来能够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有所上升，那么持有大量存款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会有所增加，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更重要的是，现在居民的投资渠道仍然过窄。再多的储蓄存放在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升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投资渠道应该在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结构要改变，不仅要解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还要更好地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比重。

目前来看，资本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尤其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应当提供更好的投资渠道，创造更多财产性收入，这对经济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第三，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

尤其要为一部分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阶层、中小微企业、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普惠金融要注重解决“融资难”“投资难”“保险难”三个问题。

金融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我国的数字金融最先解决了“支付难”的问题，并产生了积极成效。我们研究发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方式将农民和外部市场联通，业务模式由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逐渐转为平台销售，扩大了他们的职业选择空间，提高了收入。此外，数字金融还帮助很多人平滑了消费。

针对“融资难”问题，一些大科技平台利用平台数据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提供“大科技信贷”，有效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支持共同富裕。

针对“投资难”问题，许多居民不知道如何投资、向哪里投资，应思考未来能否借助类似智能投顾的数字工具帮助居民，尤其是帮助有一定收入的家庭进行理财管理。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

此外，保险是为居民提供保障的重要渠道，普惠金融也将在“保险难”问题上发挥作用。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相当不错，但现在确实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方面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下降，根本性的问题在于金融服务在一些领域供给不足，最突出的领域就是普惠金融。所以我想，金融领域可以多做一些作为，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减税降费的关键是普惠式降低企业所得税

林双林

北大国发院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减税降费的目标，是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那么，对企业而言哪些税的削减更为重要？

减税降费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研究表明企业所得税基本由企业全部承担，无法转嫁，最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对经济发展不利的第二种税是个人所得税，会影响到储蓄和投资，所以也对经济发展不利，但是弱于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的冲击力度。接下来是消费税；再次是对经济负面影响最小的财产税，这是多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结果。

在 2010 年，经合组织做了实证分析，印证了上述结论。

这几年我国不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了增值税税率和社保费用，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似乎并不明显，这可能就是由于没有降低企业所得税。尽管这几年国家零散地降低了一些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但尚未普惠式地降低此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几年我国的投资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21 年一季度第二产业虽大大增加，但 2020 年-2021 年两年间平均增长率下降，为 -0.3%。今年第一季度第三产

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近两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4.0%。民间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7%，所以投资率有待于提高。

经济增长率也是需要恢复的。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 2010 年开始一直处于下行趋势。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6.0%，去年为 2.3%，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上升明显，从 2019 年一季度到今年一季度 GDP 一共增长逾 10%，两年平均增长率为 5%，低于 2019 年同期增长率，所以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资本充足，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教育投资规模大，人力资本也很充足，老龄化问题尚不是非常严重，这就是经济发展难得的机遇，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要致力于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我认为我国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不是非常高，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税率属较低水平，但过去三十年来，发达国家都在降低企业所得税。根据研究，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最大，这也是发达国家在降低税率的原因。如美国 2018 年将企业所得税率降至 21%。降低之前，美国最高一档的边际税率为 38%，最后一档边际税率为 35%。此外，德国、日本、英国也都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横向比较起来，我国的税率就不算低。最近七国集

本文根据林双林 2021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31 期）”上的发言整理。



团和二十国集团同意将所得税率降至 15%，这就是最低的税率，没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据经合组织网站数据，加拿大税率为 15%，匈牙利为 9%，爱尔兰为 12.5%，采用最低税率对这些国家可能都会产生影响。

体现我国企业所得税偏高最明显的证据是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2019 年我国这一数据为 23.6%，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比是相当高的，甚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据经合组织数据，2018 年法国为 4.6%，德国为 5.6%、美国为 4.4%，英国为 8.6%。

我国企业所得税这么高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是税率，我国的税率比一些国家高；另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大，扣除少，许多国家的税率看似很高，但扣除多，税基小，最后企业实际交的税就不是那么多；此外，在企业亏损的时候，我国规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仅为五年，而有些国家的期限很长，如法国、瑞典是无限期扣除，有的国家还规定，若企业当年亏损，但上一年度纳了税，企业还可以有退税政策。

我国目前尚未普惠式地降低企业所得税。虽然零散的降税政策很多，给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时间减免税收，但没有普惠式地降低企业所得税。我国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尤其是使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更多的成本。

另外，我国降低了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很多税项，但对企业的压力缓解较小，因为企业本身就可以将增值税转嫁给消费者。但企业所得税完全由企业股东承担，很难转嫁，对企业影响较大。

此外，我国可以降低关税。

目前我国关税占 GDP 的比重较低，2018 年为 1.82%，2019 年为 1.83%。最近我国也和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这些都是很好的，且降低关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很小的。要争取和更

多的国家签零关税协定，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国际关系改善。

在新阶段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财政可持续性的定义各种各样，但实质基本上差不多：一是要满足当代人基本需要，且不损害后代的利益；二是长期维持现有支出、收入和债务规模。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 2011 年指出，直观的财政可持续定义是，长期内债务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增加或者减少。当然，现有债务规模是否最优是值得讨论的。

按照官方数据，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 2020 年为 20.6%，地方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 25.3%，相加约为 45%-46%。进一步考虑隐性债务，即负有救助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地方政府债务，考虑这部分债务后，我估算的地方政府债务约占 GDP 的比重为 41.5%。此外中央政府还有其他的债务，铁路公司和一些政府部门也还有债务，这些债务占比约为 5%，加总后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为 67%。这个债务率比很多发达国家低得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20 年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31%，日本甚至达 266%。

如何才能使债务规模不变，即让财政可以持续呢？

我们讨论一下财政赤字。今年我国安排的财政赤字率是 3.2%，今年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是 6% 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是 8.4%，明年会是 5.6%，世界银行最近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是 8.5%，明年是 5.4%。在这里，我推导出一个公式，可测算可持续财政赤字规模：可持续的财政赤字率 = 现有债务率 × 经济增长率。

按照官方数据，目前我国债务率为 45%，当

然这不包含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根据测算，包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债务率约为67%。我们可以使用官方数据计算，因为现在讲的赤字是公开的预算赤字。若按45%的债务率计算，如果经济增长率是6%，今年可持续的财政赤字率，即财政赤字与GDP的比重应该是2.7%，这表明如果赤字率不超过2.7%，债务率就不会增加；如果经济增长率是8%，可持续赤字与GDP的比重就是3.6%，比3.2%的财务赤字安排还高；如果经济增长8.5%，这个赤字与GDP的比重就是3.8%。按这样计算，如果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率能够达到7.2%，3.2%的预算财政赤字率就是可以持续的，债务率不会增加。

假定债务率是60%，经济增长率是6%，可持续赤字占GDP比重就高得多了，为3.6%；

如果GDP增长8.5%，赤字率就可以是5%。初始确定的债务率很重要，因为定的债务率越高，可持续债务赤字率也就会跟着提高。

可持续债务赤字率等于债务率乘经济增长率，所以经济增长率也很重要。既然经济增长率很重要，我们就应该致力于经济增长，要千方百计调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生产发展了，经济增长了，国家税收也就增加了，赤字率就减少了，债务率就会下降，这就叫做依靠增长化解债务。债务的绝对水平是很难下降的，都是由于分母大了，债务率才会下降。通过上面推导出的公式可以判断赤字率是不是可以持续，财政是不是可以持续。

这就是我关于财政可持续的看法。



如何重构组织价值，开启新增长

陈春花

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企业如何持续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我们要寻求价值本身所创造的可持续性。下面我跟各位交流一下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新的理解。

触手可及的未来和新的现实

2008年，我提出「价值型企业」这个概念，在之后持续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今天的变化实际上是比之前速度要快，于是我用了这个词叫做「触手可及的未来」。

今天在四个方面都是全新的：

新世界：这个世界是数字世界跟物理世界的融合，我们已经不再是简单在一个物理世界当中；

新世界观：在这样一个新世界当中，我们必然是要有一个新的世界观，即不再是之前的部分之和为整体，而是整体已经大过部分之和。

新理念：世界观的调整带来理念的更新，因此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个体、企业、社会还是自然，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太可能把企业单独视作一个商业的概念，它必须是社会的企业。

新领域：我们今天出现非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可能性，它其实是由知识社会兴起所带来的创新。

而这一系列的新就意味着在管理当中必须面对全新的现实。如果以过往的经验来看今天的现实，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找到这个价值背后的逻辑。

当来到新的世界、新的现实，无论是个体，还是驱动社会兴起的知识，或是商业本身，以及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个体：2015年，我就跟大家探讨过在数字背景下的个体价值崛起。德鲁克曾说“个体无所不能，又百无一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个体能够跟更多的人组合在一起时，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但如果认为你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意味着个体跟世界已经完全互联在一起。

知识：带来今天巨大调整与创造的实际是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所有变革，称之为知识社会的兴起。在知识社会带来更多的挑战、机会和价值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技术和知识？其实你要看到的是责任。这让我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责任必须追随知识”，当你拥有技术和知识时，应该心怀敬畏，承担责任，而不应该仅仅是变得更具权力性。

商业：今天我们看待商业，它充满刺激，至关重要，甚至是激动人心。但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变化背后的逻辑，这样我们才能在无限的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责任与位置。

生活：究其源头是我们生活的根本调整。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当中，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一切在逝去，而更重要的是充满了更多的挑战 and 机会。

本文根据陈春花2021年9月15日在第五届《商学院》商业领袖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寻找中国最具价值企业”颁奖典礼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超越行业，数字化技术带来联动效应

我在过去十年间一直研究数字技术对企业的影响，曾陆续出版了几本书分享给大家，最新的一本书也将会在9月下旬上市。其实大家都能发现，如今我们都在互联之中，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行业，你也会发现已经完全超越行业本身。

这种超越其实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它使得我们在硬件、软件、数据、算法一系列的基础上形成了「联动效应」，从而改变企业的生存空间，进而空间的价值被完全调整。

联动效应一：场景重构

今天会看到非常多的场景连通在一起，这使得上下游的关系完全改变，行业中价值主张的空间也被调整。如果企业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存，不能让上下游的伙伴很好地生存，那么这个新的价值空间实际上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联动效应二：数据贯通

通过底层数据的分享和应用，看似毫无关系的行业产生了共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 very 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尤其是2020年疫情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物理距离隔离的世界，而数字世界是在真实存在的空间当中。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行业的服务帮助我们，让生活得以持续。

联动效应三：价值互通

通过将不同场景下的用户关系和数字资产进行融合，就能够在可控的成本下打造出一个具有巨大磁场的价值体系。如亚马逊通过Prime会员体系，连接起了一系列业务：电商、流媒体服务、电子书、物流、AWS、智能硬件等。

重新定义组织管理

这些超越行业带来的所有变化，其实就使得组织的管理和组织成长的价值开始有新的不同。在今年4月份，我出版一本书叫《价值共生》，

就是想告诉各位，面对新的技术背景下来的行业变化，组织的意义以及组织管理的命题都与之前大相径庭。

与过去相比，组织管理中的四个关系（个人与目标、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环、组织与变化）都被完全改变。



过去	今天
个人目标服从组织目标	组织目标涵盖个人目标
个人服从组织	强个体影响组织
组织所处环境相对稳定	组织所处环境不稳定
组织易于适应变化	变化的影响超越组织本身

之前组织在这些关系中都可以有主动性。你可以让个人服从你的目标，服从你的组织；你可以超越环境，相对有自己的稳定性；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变化相对没有那么剧烈。

但来到今天，你会发现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组织不能融合，个人可能跟组织不在一起，所以组织受强个体的影响。而变化是完全不确定的，超越了你的组织环境，更重要的是环境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变化不可预测，环境是不确定的，那就意味着组织管理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十几年当中，我不断地研究这个话题，发现组织当中一些关键的价值构成要素也都发生了变化。



	传统	新型
组织结构	金字塔	网状
人在组织中的作用	执行	专家
组织内部关系	分工	协同
评价	收入	产出
薪资	岗位	技能
职业发展	组织主导	自我主导
流动性	单向	多向
特征	固化、稳定	变化、动态
风险	僵化	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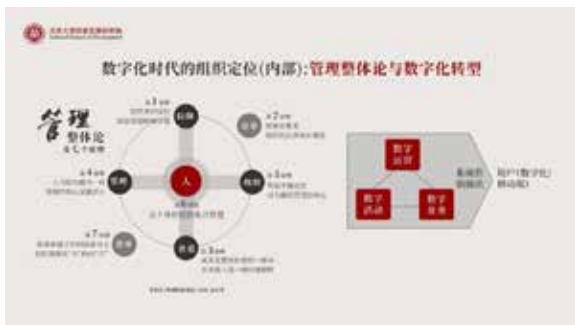
我不把它一一展开，有兴趣可以参看《价值共生》这本书。我只简单讲一条，我们过去会担心组织本身，因为结构使其变得非常僵化而具有巨大的风险，可是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个结构，就遇到另外一个风险——混乱。所以你会说必须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融合的解决方案背后的基本逻辑起点就是价值本身。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价值本身，我们就不要特别在意混乱，反而特别在意的是能不能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求确定性，这个确定性就来源于价值创造。

组织价值重构三个关键词：赋能、共生、协同

今天，组织形式发生了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变化：

从内部来讲，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做数字化转型，那么数字化的转型怎么能够成功？我在之前就这个主题做研究的时候告诉大家，你必须按照整体的概念去做转型，而在整体的概念当中最重要的贯穿线，也是组织管理的起点，就是经营者的信仰——创造顾客的价值。如果你能够从创造顾客价值的逻辑去起步，你的转型就有明确的方向，就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效。



从外部去讲，企业跟顾客之间，企业和伙伴之间，要做一个价值的重构，让我们所有的顾客

和伙伴能够围绕着顾客产生新的价值，使创造得以持续成长。因此，你会看到所有的外部企业都有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平台化和生态化。



前一阵做调研时，很多企业家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多元化，还是聚焦专业化？我说，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停留在工业时代。

在工业时代，我们会讨论多元化或者聚焦专业化。但来到数字时代，我们需要讨论生态化，你的组织需要有能不断地推进平台化与生态化的过程。

因此今天各位所看到的这些组织形式的变化，意味着组织管理不再是我们原来看到的命令管控和彼此之间的交易关系，而是赋能、共生和协同。



我们更关注组织能不能让更多人跟你一起追求更有意义的价值创造、更有灵魂的生命存在和更可感知的成就，而不仅仅在于你的盈利。我们今天所要探寻的不是一个商业纯粹的概念，而是商业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才是商业本身的

价值。

下一个篇章：融合生活驱动人类进步

对于任何一个商业企业来讲，融合生活驱动人类的进步，是我们的下一个篇章。2019年，我应邀参加《财富》的500强排行榜时就写了一篇文章，用了这个标题。

如今我们关注世界500强，不在于其规模，而是看其是否驱动生活以及人类进步，从而判断你是否有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围绕这个命题，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五个变化：

价值回归：

我一直坚持三个观点。

第一，人在生活中不是“消费者”，而是“生活者”。因此，所有的商业其实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而不是提供商品。

第二，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要承担多元责任，不仅仅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必须提供好的产品，更要为社会进步尽责任。

第三，技术是人类进化的合作者，技术让我们有更大的可能性与自由。怎么让技术真正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由你我共同努力的。

我称之为价值回归、伙伴关系、生活意义和共生进步。

共生：

数字世界带来非常多变化，这些变化跟我们之间应该是一个共生的关系。过去的研究当中发现共生有4种关系。一种叫互利共生，这是我们特别想要的；一种叫偏害共生，即当我跟别人共生时，其实别人会受到伤害；一种叫偏利共生，别人没有得到伤害，但只有你自己得到好处；还有一种叫吞噬替代。

希望各位在商业逻辑下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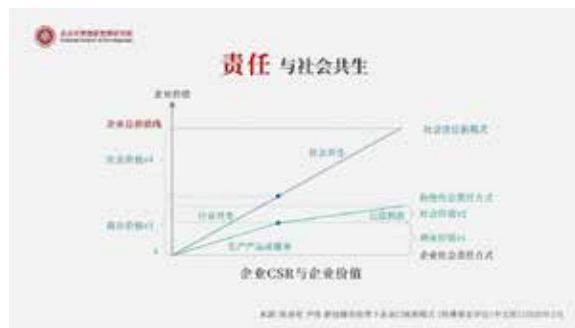
取向，至少你应该偏利共生，或者更重要的是互利共生，而不是去偏害，甚至是吞噬替代。



责任：

今天研究和探讨商业价值，不局限在讨论生产产品或者服务，还会把公益捐赠这个社会价值放进去，这些都是传统的社会企业责任。但今天我们希望企业有一个更明确的责任意识，就是与行业共生、与社会共生。

2020年疫情来时，我们发现很多企业能够积极参到抗疫这场战争当中。很重要的是他们有明确的社会责任，而在这种新的社会责任当中，不仅仅是讨论你自己，其实你需要推动行业发展以及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称之为企业总价值曲线，而这样的社会责任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



利他：

我前面反复强调，触手可及的未来以及新的现实使得所有人之间都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关系，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



同体。

因此，在经营哲学上，利他就必须是一个根本的逻辑。正如稻盛和夫所说“利他！凡是事事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事情总会出奇的顺利，内心也平静和充实。”

领导力刷新：

领导的气量、容量、格局决定企业的发展空间与成长高度。因此今天的领导者要刷新领导力，必须创造更有灵魂、更有意义、更有成效的工作场所。你不仅仅是个领导者、管理者，你还应是一个布道者、设计者跟伙伴。我在2017年写的《激活组织》这本书就是回答的这个问题。

企业持续发展价值的四个关键要素

讲到这里，我们都知道今天对公司的评估标准变了。

以前评估一家公司，我们关注三样东西：业务发展能力、客户喜欢的持续创新产品的能力、以及给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可是今天讨论企业，我们还希望你要担当以下责任：对世界的贡献，帮助改善每一个人以及长期发展。这些评估标准改变，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对整个企业的持续发展价值提出一些关键要求。

在讨论价值驱动成长时，构成企业持续发展价值的四个关键要素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

要素 1：责任型的领导者

成为责任型领导，就是为企业领导者的决策提出道德和伦理要求，让提升社会价值、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战略的行动方向。

要素 2：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德鲁克有言，“行善赚钱”的基本假设在于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辩证统一，我也非常坚持这个观点。因此企业需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企业价值观，通过创新的思维和明确的价值主张，获得具有人性关怀的盈利，为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美好生活和社会进步更显价值。

要素 3：企业能力与社会需求协同

在公益活动和很多社会挑战面前，比如控制污染、培训失业人员等，甚至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如果企业自身的能力与之匹配，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条更为高效和可靠的途径。

要素 4：共生型组织

共生型组织本质上是构建一个互为主体的价值共生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我们可以跨领域、跨行业去构建，各主体的价值创造都有助于其他主体的价值创造，最终实现总体价值最大化。

无论如何，未来最大的挑战还是我们的领导者。作为更高层的领导者，首先必须重构自身对外部的认识，重构我们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其次要从价值观和基本假设上由内而外地做一个更好的刷新，理解所有的努力必须回归到价值本身；然后在讨论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商业价值时，必须要讨论人在组织中的意义，怎么让人活得更有价值；最后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清晰地告诉自己，企业跟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德鲁克明确地告诉各位说：“没有一个组织能够独立存在并以自身的存在作为目的，每个组织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且也是为了社会而存在。”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价值型企业和价值驱动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数字时代企业竞争战略的三大变化

谢绚丽

北大国发院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什么是企业战略？“战略”中的“战”原义是战斗、“略”即谋略，意思是在打仗过程中战胜敌人所采用的方法。在管理中，“战略”是确立企业根本的长期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必需的行动序列和资源配置。现在，企业、国家甚至个人都需要制定战略，战略因此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概念。

数字时代企业战略的三大变化

数字时代的到来，引发个人、企业、社会以及全球众多领域的巨大变化。具体到数字时代给企业战略带来的变化，我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竞争环境，行业边界不再清晰；二是用户需求，需要重新思考价值主张；三是商业模式，要从做产品到建生态。

（一）竞争环境：行业边界不再清晰

以前，在分析外部环境时常用的工具是“PEST分析模型”和迈克尔·波特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五力模型”。这些工具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行业边界非常清晰，竞争者、买方、供应商、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共存于这个边界之内。但是来到数字时代，行业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竞争者可以来自原本无关的产业。我们来看两个实际发生的例子。

第一个是Garmin（佳明）。1991年佳明发

布了首款名为GPS100的产品，最初的目标应用主体是小型船只和飞机。这一新产品非常受欢迎，当年年底公司就实现了盈利。7年后佳明推出汽车导航仪，宣告纸质地图时代终结，并开创了“汽车导航”这一产品类别。这也让佳明转型为消费品牌。尽管第二款新产品同样风靡一时，但手机+地图技术的快速出现，使得车内导航仪市场随之消失，佳明的新业务受到重创，所受到的跨界颠覆也始料未及。

佳明是如何应对的呢？恰好之前它有一批非常爱好跑步的员工，他们便把导航仪技术运用在智能穿戴设备上，如将手表和导航结合起来指导运动，包括帮助运动员规划路线，帮助登山者在登山过程中判断具体位置，帮助垂钓者找到鱼群。也就是说，它反过来模仿跨界颠覆者在新的场景中扩大技术应用，最终将自身产品渗透率提高到行业前列，仅次于苹果手表。

另一个是富士胶片。2012年富士实现销售收入266.83亿美元，营业利润13.75亿美元。同年，销售规模曾是富士20倍的柯达以破产清算告终。作为同行，在数字成像技术的颠覆下，富士是如何做到不败反赢的呢？

首先，明确趋势并进行了破釜沉舟式的变革，包括削减感光材料事业领域相关人员约5000人，重建费用高达2500亿日元。

其次，聚焦核心技术，即从已经掌握的精细

本文根据谢绚丽2021年7月带领BiMBA学员前往成都开展“创新创业新生态”访学期间的主题演讲整理。



化学领域的尖端技术中，厘清可以重点或新涉足的领域，主要确定了六大重点发展领域：医疗生命科学、印刷系统、数码影像、文件处理、光学元件和高性能材料。

再次，开拓跨界延伸之路。胶卷和皮肤的主要成分都是胶原蛋白，都需要抗氧化来防止褪色或延缓衰老，富士开始生产液晶屏专用的偏光板保护膜，并慢慢延伸至医疗生命科学，包括护肤品、X光胶片、数字诊断图像设备、内窥镜、超声设备、血液分析系统、生物制药、再生医疗等。

上述案例生动地表明，如今企业的竞争边界不再清晰，完全可能因为跨界颠覆者的闯入，或者技术的快速更新而被粉碎。在这样的时代，企业需要像佳能和富士那样，既坚持擅长的领域，同时又不死守曾经的竞争边界，还能基于核心技术重新拓展应用，发展出新的能力，赢得一片新天地。

（二）用户需求：价值主张升级

任何产品一定有其想要满足的某种客户需求，比如产品新颖、价格便宜或者性能出色。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客户的价值，它要求企业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产品为中心、通过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方法，关注具体场景下客户的痛点、满足客户更高层次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们的需求也在变化。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KTV和改良型的独立歌唱娱乐小空间模式，由于年轻人群的喜好变化而不再备受关注，K歌已经不潮了。如今大部分人已经满足了最底层的生理需求，接下来升级为满足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企业也需要不断关注消费者需求层次的变化。

传统的产品可能侧重于好用、好吃等基本需求的满足。但当人们从注重价格到注重品牌，进而注重性价比，甚至只是追求特殊的体验和参与，企业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显然也要做调整。

到底怎么挖掘消费者需求？真正的需求又在

哪里呢？传统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把消费者请过来进行观察和访谈，另一种是自认为消费者喜欢什么。这两种方式都会被数字时代的竞争摒弃。数字时代做消费者洞察一定要学会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客观的数据反馈和分析，帮助企业更准确地抓住消费者需求，并由此来驱动决策。数字时代的产品要从消费者出发，以用户和行动为导向，然后不断地科学验证、科学试错，最终快速迭代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具体而言，数字时代这种挖掘需求的方法，可以将其提炼为五大“精益创业”原则：

第一，用户导向原则，即以用户为中心，不是自我为中心；

第二，行动导向原则，要让行动优先于认知；

第三，科学试错原则，通过科学试错，深化认知；

第四，目标可移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修正；

第五，快速迭代原则，包括场景快速迭代，因此产品要放入市场中检验，它不一定是完美的产品，我们称之为最小可行产品（MVP）。企业应该在最小可行产品阶段就进行客户测试，不要等已经做出完美产品再推向市场，因为后者失败的几率会更大。

下面以元气森林为例，看看该品牌在数字时代是怎么做产品的。

饮料行业无疑是一个传统行业，在碳酸饮料、茶饮料等细分市场早都有巨头把持。元气森林作为一个新兴品牌，仅成立4年后，就迅速做到20亿元的销售额。它成功的原因与其来自互联网行业，把互联网的基因带入了饮料行业有关。传统饮料企业的商业模式是管理经销商，而互联网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元气森林就是把消费者作为自己产品设计的最核心驱动要素。

首先，做什么样的产品？外部环境的大势是做市场需求判断的首要考虑因素。元气森林的“零

糖零卡”产品火爆一时，靠的正是对长期趋势的准确判断：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注重健康。在这个背景下消费者既想要喝健康的饮料，又不想牺牲口感，还想追求一点小小的刺激，于是“气泡+甜味+零卡路里”这种时尚饮料满足了人们既要健康也要口感的需求。

其次，产品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成本为中心。元气森林一瓶饮料的市场价格是5元左右，其毛利率只有30%。而行业饮料巨头的毛利率能达到60%以上。为什么元气森林毛利率低？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原料的选取上比同行更追求极致。最开始，行业专家为他们设计的产品策略，要求成本要控制在5毛钱。可是用5毛钱做出来的饮料实在不好喝，于是他们推倒重来，要求做出的饮料至少愿意给自己和家人喝。这里面就包括改用口感更好的甜味剂——赤藓糖醇，仅这一项原料就要比原来行业普遍采用的阿斯巴甜贵一百倍左右。

再次，引入互联网的AB test模式，从广告测试、口味测试、电商测试、便利店测试四个层面，用数据驱动，快速迭代出最优产品。

广告测试：通过在线上发布不同的产品定位的广告，测试哪种方案点击率更高。

口味测试：在社群中招募体验官，免费提供饮料试喝点评。即用实际客户做测试，而不是让自己的研发团队试喝。

电商测试：把实验性产品放在电商店铺中销售，卖得好的产品才会大面积铺开。

便利店测试：便利店是新生品牌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因此还在便利店中派出专人观察消费者的真实选择过程。

通过这些不间断运行的大量产品测试，最后元气森林才能快速推出广受市场欢迎的新品。

（三）商业模式：从做产品到建生态

数字时代最不容忽略的是商业模式的变化。

如果说传统商业模式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创造，即企业要选择为谁创造价值，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二是价值提供，企业要通过一系列的资源配置和活动安排来创造和交付价值；三是价值获取，即如何从价值提供中获得利润。

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与传统模式大不相同。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价值获取模式的变化。传统意义上，饮料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卖饮料来赚钱，快递公司就是通过送快递来赚钱，但互联网的产品和服务通常是免费的，如何盈利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以奇虎360为例，曾经我们电脑上的杀毒软件都是要付费的，后来360把杀毒软件做成免费应用，给安全行业带来了颠覆式的冲击。之后，通过免费而积累的海量用户为入口，360推出了浏览器，下载率还不低，可以获取不菲的广告收入。再下一步，通过开放给第三方应用，浏览器上一个游戏的按键就可以产生20亿的年产值。可以看到，从最初做软件到做互联网，到最后变成平台，360的商业模式在不断变化，最后的盈利部分也不再来自于传统的杀毒软件。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商业模式变化，是价值主张的变化，消费者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产品，而是要一套整体解决方案。比如电动汽车，消费者不仅需要汽车，更需要一辆可以随时有足够的电，能在路上跑的汽车。因此车企不仅需要制造汽车，还要解决充电网络的问题，消费者才会更愿意为电动汽车买单。

但是一个企业很难独立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于是数字时代企业价值交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任何产品如果转为解决方案，企业需要与产品互补者合作。互补者的参与能让产品产生1+1>2的效果。比如苹果手机，如果没有各种APP在里面运转，它的价值会小很多。

当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价值链从供应商、企业顾客增加到互补者等其它方面时，这其实已经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企业，需要营造自己的生态，培育自己的互补者。从这个角度讲，



战略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重要了。

从小米看数字时代的企业竞争战略和实践

下面我们以小米公司为例，来详细讲述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

价值主张

性价比 性价比是小米为消费者提供的第一个价值主张。小米的成功，离不开对大势的判断和把握。在对中国的市场进行分析之后，小米提出“蚂蚁市场”的概念，就是在很多领域，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也只有 15%-30% 的市场占有率，行业里缺大象，大多是小蚂蚁。而且这种蚂蚁市场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一两个产品品质很好，但是很贵，而大部分产品虽然便宜，但质量很差。总之，消费者很难买到既便宜又好用，即高性价比的东西。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必然要升级。

因此小米用搞计算机、做手机的思维和能力去改造插座、充电器这样的产品市场，包括按照最严格的标准生产、改良材料、设计优化等，让整个市场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

参与感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划分，参与是在生理、安全等需求之上的，体现人们自我实现的一种需求。以小米的 MIUI 系统为例，它的团队成员不光有小米的工程师，它还让粉丝们来参与内测和开发。小米以“just for fans”作为 slogan，将参与感作为另一项重要的用户价值主张。

价值交付

如何交付高性价比，具有参与感的产品？小米互联网七字诀在这里得到了深入体现：一是专注，小米称之为爆品策略，即做产品不会做很多系列和型号，往往会只做一款，使其成为爆品。这便是专注带来的规模效应，而且可以大幅降低

成本。二是极致，以消费者为中心做极致的产品，材料、设计都要追求为品质、性能服务。三是口碑，在营销方面小米主要靠口碑，营造粉丝。同时它通过线上零售，降低营销和渠道成本。四是快速迭代，以高效率跑赢同行。

价值获取

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表示，他们的综合毛利率永远不会超过 5%。小米手机的平均毛利率，远远低于苹果、三星等产品，那么小米怎么挣钱？

小米生态链是 2016 年以后小米采取的一个新战略，从手机向周边产品扩展，到包含各种家电和日常生活用品。

小米生态链有其重要的战略逻辑：

第一，选品原则，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进入生态链，生态链产品要与小米手机的客户群体高度重合，需要满足 80% 的既有客户 80% 的需求。

第二，参股而非自营，最大化通过合作借力。

第三，高低搭配，一是高频产品和低频产品互配，比如消费者不会一年买很多次手机，因此小米生态圈中纳入了插座、牙刷等更换频率要远高于手机的高频消费产品。在高频和低频搭配下，小米零售店里会有更多客流，这是高频、低频组合来促进销售的方法。二是高毛利和低毛利形成组合。小米手机低毛利，但周边产品高毛利，综合毛利率使其价值获取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这些周边产品还在营造一个新生态即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从小米年报看，小米平台上连接了全球除去手机和电脑之外的 3 亿多部智能设备，其中 600 多万“米粉”级顾客拥有超过 5 台设备，米家 APP 活跃用户也超过 4500 万。小米通过生态链，为消费者提供了一套家居解决方案，其 IOT 平台的价值空间巨大。

小米报表显示：智能手机虽然是销售额最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毛利率只有 7%，而 IOT 产品和互联网服务部分比例贡献虽然小，但是它

们的回报率高，例如互联网服务的毛利率高达65%。通过生态链战略，小米实现了价值获取。

最后简单总结，数字时代的企业战略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要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竞争，以创新改变竞争格局。

第二，大道至简，用户为王。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通过用数据驱动快速迭代形成产品。

第三，扬长避短，守正出新。本质在于建立和挖掘自己的核心能力，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营造生态创造新的价值。



1. 2021年9月6日，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开学典礼在承泽园新院区举行。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执行院长姚洋、学术院长傅军、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副院长陈润云分别致辞。来自32个国家的77名新生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加。
2. 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杜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等出席启动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商务部、北京市文物局、人民大学、新华都集团、台塑企业、腾讯集团、新希望集团等对承泽园建设给予支持帮助的上级部门和友好单位代表。学校老领导、为国发院创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代表任彦申、闵维方、林建华、林毅夫、海闻、张维迎等应邀参加。仪式由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主持。林毅夫、姚洋、余淼杰等为重要捐赠代表颁奖。承泽园前身为清代皇家园林，1953年归入北大。2008年，国发院承泽园院区项目正式立项。2015年，承泽园新楼奠基，园林古建同步修缮。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多部委支持下，北大、国发院师生校友、多家知名企业、基金会、海淀文物局和承建单位勠力同心，使建设顺利推进，于9月19日全面落成启用。
3. 2021年9月24日，由新希望集团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永好公益基金会和北大国发院“村长工作坊”共同举办的首期乡村振兴“村长班”在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承泽园院区永好楼正式开班。未来五年，乡村振兴村长班计划每年举办两次，每年培训100名乡村基层治理者。首批学员由来自四川、江苏、河南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名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组成。
4. 2021年10月15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荣获2021年度“教学大师奖”。该奖由深圳市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与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旨在表彰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具有全球卓越教学影响力、扎根教学一线的高校教师。
5. 2021年10月21日，北大国发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曾毅教授被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简称IUSSP）授予“2021年度IUSSP桂冠奖（2021 IUSSP Laureate Award）”，旨在表彰他为推进人口科学所做的杰出贡献。该奖于1991年设立，是全球人口科学界的最高荣誉，旨在表彰对人口科学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IUSSP成员。往届30位获奖人均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极少数国际机构，曾毅教授是首位来自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获奖人。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